

■行业观察

《数字阅读新生态 2024—2025 年中国数字出版发展报告》发布

数字出版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

□本报记者 张君成

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不断深入推进，数字出版作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载体，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的《数字阅读新生态 2024—2025 年中国数字出版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政策引领、产业布局、用户生态等多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我国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报告》指出，多家新型阅读平台在打破传统阅读壁垒、拓展知识普惠边界、激活全民阅读潜力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的支点作用，折射出数字出版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的时代特征。

数字出版助力知识普惠

数字出版的蓬勃兴起，首先得益于国家战略的系统部署。《“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等系列政策，强调以技术创新驱动内容升级，为数字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黄楚新所言：“数字出版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报告》显示，新型阅读平台正成为技术赋能的典型样本：通过语音合成、TTS

(从文本到语音)转换等 AI 技术，实现了从“看书”到“听书”的跨媒介跃迁，极大拓展了数字出版物的可及性与服务边界。黄楚新表示，平台的多模态内容供给，构建起面向不同阅读习惯与能力群体的知识服务体系。

而在用户侧，数字阅读已是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显示，2024 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已达 6.7 亿，占全部网民的六成以上。其中，移动端用户超 90%，日均阅读时长达 80 分钟，社交评论等互动功能进一步增强了平台的使用黏性与生态活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认为：“数字阅读过去常被误解为浅阅读，但实际上，只要阅读环境适配，数字阅读完全可以实现深度沉浸与知识内化。”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阅读正在突破地域限制，助力知识公平。如番茄小说所倡导的免费模式，通过广告变现路径替代用户付费，不仅大大降低了阅读门槛，更精准契合三线以下城市读者对价格的敏感需求。数据显示，其下沉市场用户占比超过 52%，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普惠平台。这也印证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蔚华在调研时所观察的：“在偏远地区，很多人不去图书馆借书，却会用手机下载阅读 APP，这种方

式弥补了传统阅读基础设施的缺口。”

深度阅读回归趋势明显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迈入精细化运营阶段，“新质内容”正成为平台竞争的关键变量。《报告》显示，从版权聚合到互动创新，从精品导向到垂直供给，数字出版内容生态持续拓展，其背后是海量内容体系与精准用户识别能力的协同发力。

对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王鹰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供给侧看，平台正在从内容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容资产是下一阶段核心任务；从需求侧看，用户对知识性、思辨性、共鸣性的内容需求在增长，数字出版已不仅是娱乐消费，更是价值认同与心智成长的空间。”

从内容生产者到传播参与者，从内容消费者到文化共建者，青年群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并塑造数字出版的内容版图，特别是青年用户对于深度阅读的回归趋势愈发明显。《报告》显示，长篇小说与系列出版物依然是新型阅读平台受欢迎的内容形式，占据番茄小说平台内容消费的 60% 以上。历史人物、文学经典、个人成长类图书的占比也不断提升，构建出

覆盖娱乐阅读与知识阅读并重的复合型内容生态。

构建高质量数字内容资产库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平台从争夺用户流量逐步转向产业协同与结构升级，推动形成全链条、系统化的知识服务生态。《报告》指出，新型阅读平台正在构建从内容孵化、用户运营、IP 开发到商业转化的完整链条，推动数字出版迈向“以内容为核心、以服务为延展、以产业为支撑”的新格局。

然而，行业发展亦面临挑战。版权治理仍是平台亟须攻坚的重点领域。《报告》显示，整体而言，数字内容的泛滥与内容同质化问题仍在制约行业质量跃升，玄幻、言情等主流题材高度集中，导致用户审美疲劳。商业模式方面，广告收入虽支撑平台运作，但用户容忍度有限，如何在保持免费阅读体验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需平台与行业共同探索。

“数字出版平台下一阶段应把资源向精品内容倾斜，构建高质量内容资产库，推动从‘平台运营’向‘内容资产化’转型。”王鹰进一步强调，“平台间竞争应避免内卷，向产业协同和生态共建方向发展。”

■时讯

茅奖得主刘亮程两部作品繁体中文版首发

本报讯 (记者蒲添)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的两部经典作品《一个人的村庄》《本巴》繁体中文版首发式近日在香港举行。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陈鸣华表示，这两部首度以繁体中文版在港面世的作品，承载着刘亮程对生命既诗意又深邃的凝视；从疆漠边陲到东方之珠，从简体字到繁体字，变的是版本，不变的是作家文字的分量。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认为，刘亮程的写作深植于西北土地，却直指人类共有的生命经验，他的作品既有现实质地，也有精神飞翔的高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刘亮程回忆了童年阅读竖排繁体古典书籍的奇妙体验——那些“站着”的句子，从上而下阅读，如同从天而降、再返大地，构成一种连天接地的阅读感，令人着迷。

本次亮相的《一个人的村庄》《本巴》繁体中文版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此外，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还与译林出版社签署了刘亮程最新长篇小说《长命》的繁体版授权协议。作为刘亮程获茅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长命》简体中文单行本将于 8 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深圳报业树莓 VR 未来影院首店开业

本报讯 (记者徐平) 深圳报业树莓 VR 未来影院首店近日在位于深圳龙华区的红山 6979 商业中心投入运营。这一新型数字娱乐空间采用院线式常态化运营，观众可自由选择不同 VR(虚拟现实)剧目观看、体验。

深圳报业树莓 VR 未来影院由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PICO)打造，该空间实现让观众从“看故事”的旁观者成为穿越时空的“剧中人”，延伸深圳报业集团的实体空间文化传播。据悉，深圳报业树莓 VR 未来影院模式将复制到深圳更多区域，将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打造成为新型传播阵地。

“树莓 VR 未来影院以破界之力重塑市民文化体验，开辟广阔新视界。这不仅是一家极具时代感的影院的诞生，更是深圳报业集团、深圳晚报社在媒体深度融合大潮中，以系统性变革破局未来的大胆尝试。”深圳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第五届全国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研修班在杭州举办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通讯员王一鸣) 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浙江传媒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全国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研修班日前在浙江杭州开班。

本届研修班为期一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米博华等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在课程设置

上涵盖战略管理、学科建设、视听传播教育、行业观察等多维视角；在教学方式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除日常授课外，还在绍兴市和德清县融媒体中心、阿里巴巴夸克公司开展实地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张昆说，当下，媒介生态转型、人才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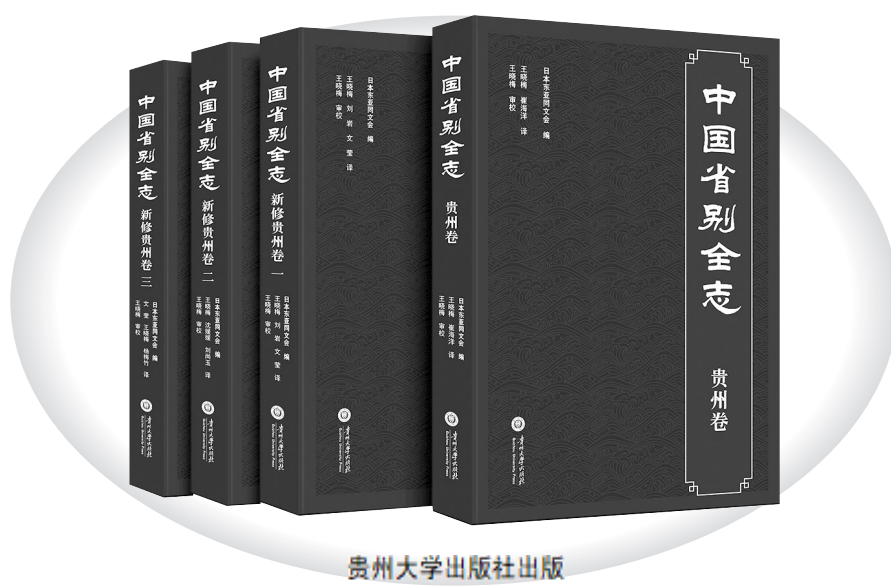
求蝶变，这要求新闻传播学院管理者不仅要自我修炼与提升，也要与教育界同行交流切磋。研修班一方面为新闻传播学院管理者提供交流的机会，研讨新闻传播学院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也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共同体的成长，促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长远发展。浙江传媒学院院长韦路也表示，研修班为新闻传播院系管理

者提供了交流互鉴、提升能力的机会，对于思考解决当前和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据介绍，自 2021 年 7 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推出首届全国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研修班以来，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已有近 500 名院长、主任或学科带头人，在此平台接受了培训。

日本编《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之双重镜鉴

□刘金才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地方志文献中，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撰的《中国省别全志》及其续编《新修中国省别全志》，是迄今为止唯一由外国人编撰并以外语刊行的中国省别方志丛编。这两套中国志书，因其编撰者日本东亚同文会的间谍机构特性，以及其编撰目的指向的侵略性和殖民性，使其成为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和实证日本对华侵略殖民的“历史档案”；而其编撰内容的全面性和精确翔实性，其调研和编撰方法的近代科学性和实证性，又使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以及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历史文献，故对于作为“被记录对象”的中国而言，两套志书无疑具有双重镜鉴价值。

以 1920 年和 1943 年先后出版的两版贵州卷为例，这两部由日本东亚同文会深入中国西南腹地编纂的方志，既承载着珍贵的史料价值，又烙印着深刻的殖民印记。透过“侵略者之眼”记录的黔地万象，呈现出一幅贵州学术价值与政治意图交织的复杂图景。尽管这些诞生于日本侵华战争背景下的志书披着“科学调查”的外衣，实则服务于殖民掠夺的目的，但其扎实的田野工作、系统的分类框架与翔实的数据记录，意外地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贵州保存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社会经济“切片”。这些记录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近代贵州的自然生态、人文肌理与社会风貌，更促使我们深入反思日本殖民情报工作的运作逻辑，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

由贵州大学教授王晓梅领衔翻译的《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和《中国省别全志·新修贵州卷》中文版，已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闻之倍感振奋。在此，想就此书之生成背景、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谈几点粗浅认识。

“东亚霸主梦”催生的殖民方志：背景与旨向

观读此书，首先需要明晰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与目的指向。编撰者东亚同文会

成立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宗旨内含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张目的深层意图，既鼓吹所谓“侵华正当论”，又服务于日本的“东亚霸主梦”。该会在中国上海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亦绝非单纯的教育机构。其创立者根津一出身日本陆军，首任会长近卫笃磨及其孙子、末代会长近卫文磨，均为日本侵华政策的核心人物。书院长期接受日本外务省之机密拨款，可谓典型的军、政、商“三位一体”的情报机构。

从丛书《译者序》可知，1901 年至 1945 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在华办学近半个世纪，培养毕业生逾五千人。这些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调查者，凭借专业的语言训练和系统的文化培养，深入中国城乡进行地毯式调查，路线多达 700 余条。他们潜入中国社会肌理，获取了许多本土研究者都难以触及的基层信息。其情报收集范围之广、数据精度之高，远非普通外国观察者所能企及。两套志书正是基于此类“实地调查”资料编纂而成。

《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成书于 1920 年，其基础资料是书院学生过去十余载的对华调查资料，既是日本在“甲

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获胜后进而实施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也是为“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尝试构建其“大东亚共荣圈”的前期准备举措。其根本目的指向是一切服务于日本侵略扩张野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阅读时需警惕其话语立场与信息择取的偏向性。

《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出版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 1943 年。此时日军深陷中国战场，亟须掌控大后方情报。贵州作为连接西南、西北的战略枢纽及重要资源产地，自然成为重点调查对象。较之初版，此版对交通、矿产、民族构成的记录更为详尽，直接服务于军事占领与资源掠夺，侵略性更为露骨。

体例创新与情报渗透：近代化书写中的殖民底色

从目录观之，两套志书呈现出系统的科学特征，是对传统方志的近代化改造。在自然环境部分，编纂者摒弃了传统方志的文学性描述，转而采用地理学、地质学等现代科学方法。例如，“地理特征”章对地势、山系、水系的科学

划分；“地质及地壳运动”章的专业分析；“动植物”章严格遵循生物分类学详列物种，并突出标注经济价值高的资源。“贵州各县气温概况”统计表更彰显了其数据化、实证化的实用取向。然而，在这种严谨的科学表象之下，其服务于日本资源勘探与经济掠夺的真实意图清晰可辨。

在人文记述中，编撰者着重剖析了贵州的社会治理与经济潜能。“省县市区行政制度”章节记录了从省府到保甲制度的基层治理，为研究晚清至民国贵州提供了珍贵资料。“民族与文化”章节不仅记载汉、苗分布，更专设“贵州方言”一节，以语言学方法分析音韵、语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经济建设行政”章节对农业改良、工业发展及采矿等战略资源的记录尤为详尽，堪称一部战时贵州经济调查报告。

这种将传统方志框架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编撰体例，实为东亚同文会“实地调查”教育模式的直接体现，其终极目的是为日本渗透与控制中国社会构建“知识基础”。

史料价值与殖民视角的张力：批判性利用之辩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动荡，系统性方志修纂几近停滞。此书恰好系统记录了这一关键转型期贵州的社会变迁。其经济数据、制度细节等方面的记录，可补中文文献之阙。作为外来观察者的记录，虽难免带有偏见，但也可能捕捉到本土学者习焉不察的现象，为研究提供独特参照。

与此同时，此志书也是研究日本对华情报活动、“学术殖民”的典型案列。其编纂体例、调查方法与关注焦点，清晰映射出殖民者的思维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方法越“科学”，其服务于侵略的效能就越大：交通数据可直接用于军事推进；方言音韵表可为情报人员提供语言训练参考。中国传统“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智慧，在此竟被扭曲为“知黔地者制西南”的殖民逻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马关条约》签订 130 周年，该志书中译本的出版意义重大。首先，中译本打破了语言壁垒，使这批尘封已久的史料得以以中文形式完整呈现于中国学者面前，为学界提供全新的史料基础。其次，中译本之问世将显著降低研究门槛，使研究者得以基于新的史料，构建更加客观、立体的历史认知框架。这些文献既是日本侵略的实证，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见证，可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话语体系提供基础史料支撑。

历史棱镜与现实意义

《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是一套充满悖论的文献。作为日本侵华野心的产物，其调查初衷虽为殖民统治铺路，却意外地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贵州留下了一份涵盖自然地理、行政制度、民族构成、方言特色、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记录。

面对这份由“侵略者之眼”记录的黔城图景，我们既需珍视其史料价值以存史补阙，亦应洞悉其生产机制以资警惕。书中诸如“省内未铺设一里铁路，交通极其不便”以及“附近山上无树，岩骨露出”等记载，不仅真实再现了昔日贵州“黔道难”的困境与贫瘠荒凉的景象，更以其客观记录反衬出今日贵州县县通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8000 多公里、桥梁总数超过 3 万座，以及森林覆盖率从抗战前的 9% 跃升至如今 63.3% 的辉煌成就。这些对比鲜明的历史记录，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成就，以及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生动而有力的实证。

综上所述，这两套志书具有多重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其中文版的问世将对于研究近代社会史、中日关系史等提供宝贵资料，更将作为鉴往知来、立志民族复兴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